一、训诂学的萌芽——先秦

1. 训诂及其起因

本书要讲的，是我国传统学科之一——训诂学的发展史。首先，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训诂。

一提起“训诂”二字，有些读者朋友可能会感到陌生，然而，只要是对传统语言学略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在传统语言学即“小学”中，训诂是与文字、音韵鼎足而立的一个重要部门。训、诂二字最初是单用的，连起来用，始见于汉代毛亨的《毛诗诂训传》，“诂训”即是训诂，在古代就有把《毛诗诂训传》称为《毛诗训诂传》的。此后，“训诂”一词基本上就定型了，如在《汉书·儒林传》中就曾多次出现，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学科名称。“训诂”就是解释，凡是用语言解释语言在古代都叫训诂。唐代小学大师孔颖达说：“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又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并见《毛诗正义》）。无论是用今语解释古语，用通语解释方言，还是用通俗易懂的话解释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懂的诂，都属于训诂的内容。用今语解释古语，是训诂的重点；对文献中的词义语义进行训释，则是训诂最基础也是最主要的工作。

按其性质的不同，训诂大略可以分为三个种类：正文体训诂、传注体训诂和专著体训诂。正文体训诂一般指存在于先秦典籍的正文之中的语言解释现象，是训诂萌芽时期的形式。尽管后世的典籍中也时有这种形式的训诂出现，但跟后二种训诂比起来，它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人们在谈到训诂时很少包含到它了。传注体训诂指为了让人们读懂典籍而对它们进行专门的注释，即传、注、笺、疏之类，这一类训诂兴盛于汉朝。专著类训诂指不是针对某一种典籍，而是针对字词本身而进行的训释，较突出的例子如西汉扬雄的《方言》及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等。这一训诂类型的兴起也是汉朝及汉朝以后的事，它标志着我国训诂学的产生。

训诂既是用语言解释语言，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同一种语言文字，为什么还需要训诂？尤其是有时候人们面对的并不是古代而恰恰是当代的语言，也同样需要进行解释，这又是何道理？

其实非常简单，首先，人们在交际中为了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需要对自己所说的词语加以解释；其次，为了科学地认识事物，也需要对语言作精密的分析，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这两点，实际上也是训诂产生最直接的原因。

但是，如果我们从全局的眼光来看，即从训诂的总体来看，训诂的产生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语言的发展性和变异性，即语言（这里当然是指汉语）由于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出现的差异。我国历史悠久，各种典籍浩如烟海，源远流长，且不说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尚书》，也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和世界上的其它事物一样，语言处在不停的变化发展之中。随着时光的流逝、地域的变迁，语言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一般说来，在经过五六百年之后，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甚至文字上的形体兴废、正字假字的习用等等，都会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以致引起阅读上的困难。西周初期的作品，到了战国时已有很多人读不懂，很多年前妇人孩子天天挂在嘴边的话，后代的大学者们毕生钻研都未必能完全弄通，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很明显的事实是，孔子在教授学生的时候，讲授《诗》等古代经典已经是很重要的内容，无疑地，讲解疑难词句是其最基础的工作。孟子在引述古人的话时，有时是边引述边解释的，这些解释，有的固然是阐发思想的需要，但也有的是析疑的需要。《国语·周语》中记载，晋大夫叔向到周王室去朝聘，周的卿士单靖公设宴招待，谈到喜欢《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这首诗。在叔向返国的时候，单靖公的家臣去送行，叔向就向这个家臣详细讲解了这首诗，讲解中包括了词、句和诗旨。这段解释

可以看作是很成熟的训诂了。被认为是训诂开山之作的《毛传》就有许多条例渊源于此。可见，先秦时人在阅读更古老的文字时，理解起来已经有一定困难，需要进行训释了。

大家都知道我国现在有许多方言，而且各方言之间的差别很大。北方人很难听懂南方话，如粤方言、闽方言等，就是南方讲不同方言的人，相互之间也几乎无法交谈。方言之间的差别，我们首先感觉到的自然是语音的不同。事实上，不单是语音，就是词汇甚至语法都有许多差异。同一个物品，同一种行为，在甲地是这么个叫法，在乙地却可能是另外一种叫法；在山东是这样的称呼，到了山西是另一种称呼，表现出语言的变异性。这种变异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人们的交际和阅读。方言的差别是不是今天才有的呢？当然不是，许多证据表明，它是古已有之的。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说道：九州之内的人们，言语不同，自从有生民以来，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这个说法应该是不错的。在《孟子》一书中，不止一次地说到了方言差别的存在，如在《孟子·滕文公下》说：如果一个楚大夫想让自己的儿子学说齐国话，那么，与其找个齐国老师来教，不如把他送到齐国住几年效果好可见，方言的差别已到了学习时需要求师并创造语言环境的地步了。《滕文公上》又说楚人许行是“南蛮鴃（音 jué）舌之人”，骂他的口音难听。方言的分歧势必会影响到人们的交际，给

交际带来困难。《尹文子·大道下》讲述了这么一件事：郑人称没有经过琢磨的玉为“璞”，周人称没晒干的鼠为“璞”。郑人到周地经商，周人问道：“你想买璞吗？”郑商以为说的是璞玉，表示要买。等取出来一看，却原来是只鼠。方言分歧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日常交际上，也表现在一些典籍上，需要用训诂的手段去沟通。

总之，语言的发展性和变异性是训诂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语言的古今差异与地域分歧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恰恰相反，这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候，语言的地域分歧往往就是语言的古今变异的痕迹，或者说是语言的古今变异的投影，语言的古今变异可以从地域变异中找到某些凭据。比如现在的方言中的某些词语，也许正是古人的常用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语言的发展性和变异性是统一的。这样，我们就更能理解清朝人陈澧关于训诂起因的精彩论述，他在《东塾读书记）中说道：时间上有古有今，就像空间上有东西南北，相隔远了语言就不同了。空间隔得远就有了翻译，时间隔得远就有了训诂。有翻译就能使不同国家的人们像乡邻一样交流，有训诂就能使古今像早晚一样没有语言隔阂。

另外，儒家提倡“正名”以及因先秦时期诸子间的论辩而兴起名学，由于它们导致了一系列语言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比如语言的性质、发展以及声义关系等，因此，它们从某种程度上对训诂的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起起了间接的促进作用。其次，先秦时期文献的大量产生，教育的发达，也从不同程度上促进了训诂的产生，《说文解字·叙》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保氏：等于说老师。国子：指学校里的贵族子弟。）这就开始了分析汉字形、音、义关系的教育，而这正是训诂学的基本内容。《礼记·学记》上也记载说：子弟入学校学一年之后就应该能够断开文章的句读并审明其思想内容。无论是分析汉字还是解读经典，都需要运用训诂的手段。这就进一步推动了训诂的产生和发展。

2. 先秦训诂的几种体裁

从上一节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先秦阶段已经出现了不少训诂的事实。如果说这个时期是训诂的萌芽阶段，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个时期丰富的训诂资料都是蕴存在经典的原文之中，是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它们以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存在于正文之中，因此有时易被人们忽视。实际上，存在于典籍正文中的这些诠释文字，正是训诂方法的开端，具有不容抹杀的价值。比如《周易·说卦》：“离也者，明也。”《周易·序卦》：“恒者，久也。”《论语·颜渊》：“政者，正也。”《孟子·离娄》：“泄泄犹沓沓也。”等等。春秋战国时期，《诗》、《书》、《礼》、《易》、《春秋》等书都已被尊为经典，人们在说话行文时引经据典成为时尚，并且在引述经典时往往随时加以解释。这些解释，有的是总释经典

大义，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诗》、《书》，义之府也。"有的是分析篇章句意字词，如上面提到的叔向对《诗·周颂·昊天有成命》的解释。《昊天有成命》一诗很短，是这样写的："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叔向解释道：

> 是道成王之德也（按：这句释诗旨，即主题）。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按：这句是对诗旨的补充说明）。夫道成命者而称是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按：这是释诗前三句句义）。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有，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按：这是释后三句的字词）。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按：这是结合了诗的头三句的解释后的概括）。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和之（按：这是结合了诗后三句的字词解释后的概括）。始于让德，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这是对诗篇进行具体分析之后的总结）。

典籍正文中还有一些解释涉及政治制度，甚至方言或虚词等内容。

除了这些类型的资料外，还有对典籍专书或篇章的专门解说。先秦时期，对各家经典都开始了一

定的解释工作。其内容主要是阐发经义和陈述史实，这也正是传注的早期形式。这些解释有的称为“传”，有的称为“说”，还有的称为“记”、“解”等等，尽管名称不同，但是解释的着眼点是大同小异的。与后世训诂相比，它们显得不是那么严密和富有系统性。现在我们简单地谈一谈这几种体裁。

传：我们在先秦典籍中时常能看到诸如“传不习乎”、“于传有之”之类的词句，可见当时典籍的“传”不但多，而且有地位，是人们学习和说话依凭的对象。“传”是对于经义的述说，古代有六艺之教，六经都有传。《史记）中记载“孔子序《书》传”，说的就是孔子序《尚书》，并录其传。《春秋》有著名的“三传”，各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文进行阐释。其中的《公羊传》和《谷梁传》直到汉代才记录成书，这里姑且不论。《左传》则在先秦就已成书了。它大体上是以《春秋》为纲，编录史实，集而成书，用史实来给《春秋》作注脚。（仪礼·丧服）中提到《丧服传》，相传是孔子的弟子子夏所作。《周易》有《易大传》，即所谓的“十翼”，是对《易经》的卦象、卦辞的多方面的阐释。

说：说就是说明、解释的意思。作为一种体裁，其实质是作者在著作中为自己作的“传”，即把自己的“经”义再加以阐发和解释。这种“经”、“说”出现在同一书中的情况多见于诸子的作品中。《墨子》中有《经上》《经下》，又有《经说上》和《经说下》，《经说》即是对于《经》的解释。《韩非

子》的《内储说》和《外储说》各有“经”和“说”（或作“传”）两部分。“经”在前，先概括地指出所要说明的事理；“说”在后，把“经”文中的历史故事一一叙说。

记：记是记识的意思。唐代小学家孔颖达《记冠义》疏道：“凡言记者，皆是记经不备，兼记经外远古之言。”可见“记”并非专为解释经文而作，和“传”、“说”是不一样的。如《仪礼》十七篇，大多都有“记”文附于篇末。

解：解就是分析。如《礼记》中有《经解》，其内容是分析六经体教。《韩非子）中有《解老》，用法家观点分析解释《老子》经文。《管子》中对《牧民》、《形势》、《立政九败》、《版法》、《明法》等篇，又独立有“解”。“解”也是一种自作的解说。

以上几种是先秦传注体训诂的主要体裁。此外还有一些体裁，如“故”，（国语·周语）中提到《太誓故》一书，就是对《太誓》的解释。所有这些体裁，都是着重阐发微言大义，挖掘经文中的具体所指，或给经文提供例证，对于词义训释，则相对较少。在这一点上，它与后代的训诂是大异其趣的。

先秦训诂不但体裁丰富，而且训释的方法尤其是词义训释的方法已经粗具规模。在释词方面，后世训诂的主要手段即形训、义训、声训在这个时期都已大体完备。

所谓形训，即通过字的形体来推求词义。由于古代的汉字具有表意的特点，字形与字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因此，通过字形大多可以推求出它所表示的意义。先秦的训诂中也运用了这一方法来进行训释，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说“止戈为武”，认为“武”字由止、戈构成，武字的意思即是战胜国在适当的时候能停止干戈。《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反正为乏”，又《昭公元年》说“皿蟲为蠱”，都是通过字的结构来释义。尽管文中的旨意并不是要讲解字义，而是通过讲解字义去表达某种思想，它有很大的主观性，但是这种讲解，确实是训诂，用的是形训的方法。

所谓义训，即是仅从意义的角度进行训释或者作出义界，而不考虑词义来源与形义关系。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普遍。如《周易·丰卦》“丰，大也。”又《系辞》：“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仪礼·丧服传》：“菅屨者，菅菲也。”《左传·文公七年》：“同官为寮(僚)。”《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一般地说，先秦时期的义训还是较为准确贴切的。

所谓声训，即是采用音同或音近的字词来作训释，并从声音线索上寻求词义之间的联系。如《周易·序卦》：“蒙者，蒙也。”《礼记·表记》：“仁者，人也。”《孟子·滕文公上》：“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礼记·祭统》：“福者，备

也。”等等。声训的运用，在先秦也是十分普遍的。尽管声训作为一种训释方法，其本身的价值不容置疑，然而在先秦，由于它主要还是用作表达思想的手段，因此在运用上难免有时失之于牵强附会，对于同一个字词，不同的人或在不同的地方，其说法会各不相同。但这只能说明，先秦是声训运用的初始阶段，存在粗糙和不精密是正常的（其实，这一方法直到清代才较为精密）。

由此可见，存在于正文之中的正文体训诂由于还处于训诂的萌芽时期，它与后来的传注体训诂和专著体训诂比起来，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它是在行文中为了表达和认识事物的需要而出现的，有些注解现象，实际上就是作者论述问题的一种论据，这是它的特别之处；其次，它的释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自己的表达要求来进行，因而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无论是声训、义训或形训都是如此。这种特点，既体现了当时训诂的成绩，也体现了其局限。我们就应该而且可以给它们一个合理的评价，不必苛求古人，更不必全盘否定这一时期的训诂实践。

3. 先秦训诂的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先秦时期确实已经有了一定的训诂实践，存在着很多的训诂材料，具有较丰富的体裁和较完备的训诂方法它的局限和不足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它的体裁和方法都还比较粗略和幼稚，其运用也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得较为随意、简单而无系统性；它都是出现于正文之中，未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完全是为了实用；训诂的核心——词义的训释还不占主要的地位，术语不多，有时运用得不是十分严格，而且没能产生专门的训诂著作、形成有系统的训诂学科。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价值。先秦是训诂的起源期，可以说，没有先秦的训诂就没有两汉的训诂。先秦时期的很多训诂成说和方法，大多都为后世所采用并发扬光大。比方说，先秦有“同字为训”的体例（如“蒙者，蒙也”），汉代训诂学者继承了此法，但大多数用“异体字”或“古今字”互为训释（如《尔雅·释诂》“于，於也。”）。先秦的声训、义训和形训，直接开创了后世训诂的三条重要道路，汉朝训诂学著作《释名》、《方言》、《尔雅）和《说文》，正是在这三个领域上结出的丰硕成果。总而言之，先秦的训诂虽然较为粗率，但它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训诂的兴盛和训诂学的形成——两汉

1．训诂兴盛的原因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其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内因，二是外因。汉代训诂的兴盛，其内因是语言的发展变化，其外因——也是更为引人注目的原因——则是有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因素。

语言的发展变化这一点很好理解。到了汉代，语言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春秋战国时的许多著作，已经不好懂了。要研治前代的经典，训诂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尤其是解释词语，更已成为阅读古籍时可需解决的问题。从汉人的传注中我们不难看出，词语的解释占据了突出的地位，与先秦以阐发经义为主的传注相比已经有了质的区别。由于语言的变迁，对古语和方言的解释变得更为重要。同时，对长期以来的语言文字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大量的随文而释的词义训诂进行归纳和概括，也已显得十分必要。这就是《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这四大训诂专著产生在汉代的重要原因。此外，还有其它诸多方面的语言文字的因素，如文字形体的演变，汉人对音义关系的新看

法，音韵学的萌芽等等，都推动了汉代训诂学的发展。

然而，汉代训诂学的形成和发展还有其更为引人注目的原因，这就是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原因。先谈谈政治上的原因。大家知道，秦始皇在用武力兼并天下以后，并没有把施政重点转变到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和文化上，而是变本加厉地奴役百姓。他大兴土木，造阿房宫，筑万里长城等等，劳民伤财，用刑法强迫老百姓服役，搞得民不聊生。结果，他所做的一切加速了他的灭亡，秦皇朝只存在了短短的 20 多年就在人民的怒吼声中土崩瓦解了。汉高祖刘邦看到了秦朝灭亡的原因。他在统一中国以后，以史为鉴，采取了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文化。在长期的战乱后，最重要的文化任务就是搜集前代的文献典籍并加以整理解释。汉惠帝初年，废除了秦始皇颁布的“挟书之律”（藏书禁命），儒学开始传授，经、子都流行起来。但是当时还是黄老、刑名之术占统治地位，加上开国的功臣大多是武将，比较厌恶儒生，因而儒学的发展没有形成气候。汉文帝以后，诸王逐渐强盛，天下逐渐地不安定，再用黄老的政治思想已经统治不了啦，儒学于是抬头，如（鲁诗》、《韩诗）都开始兴盛，但是力量还显得弱小。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国家的思想建设显得更为迫切，儒、道之争极为激烈。汉武帝起用董仲舒和公孙弘，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以礼治天下，“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用儒学为统治工具，经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朝廷开设了五经博士，在京城建立学校，大力提倡和传授儒家学说。《五经》即是《易》、《书》、《诗》、《礼》、《春秋》。一般每经的传授都不止一家，而是有若干家，因此每经所立的博士也就不止一个，五经共设立有十四博士。博士就是国家任命的教授。凡是博士的经说都被定为正经，凡不合博士经说的一概被否定。博士的弟子由各郡县推荐，一旦成为博士弟子可以终身不服徭役，学习成绩优秀的可以做官，因此，许多出身寒微的人由于精通经书而当上了大官。这个措施一下子就把普天下的读书人吸引到儒家经典上来，儒家独尊的地位日益巩固。说经就必须通训诂，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那时著名的经学大师，也就是著名的训诂大师。因此，经学的发展推动了训诂学的发展。这是汉代训诂兴盛的政治原因。

由于朝廷的提倡，经学的兴盛，各种典籍的整理工作势在必行。原来在经过秦火之后，典籍散失，除了医药卜筮、农书外全都亡佚了，博士们所传授的经典并没有传本，都是靠博闻强记的经师们通过口耳相传，一代代地流传下来的。这时，他们就用当时通用的隶书誊录下来。这些博士经就是所谓的“今文经典。”在西汉前期，官方博士所讲授的儒家经学都是今文经。

在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为了扩充宫室，拆除孔子旧宅，在宅壁中得到（古文尚书）以及《礼记》、

《论语》、《孝经》等一部分儒家经典，一共有数十篇，都是用战国时东方六国文字写成的，称为“古文经”。此外，还有河间献王刘德得到的《周官》、《礼》、《礼记》、《孟子》、《老子》等古文经。今文经和古文经从表面上看只是文字书写方式的不同，传本的不同，但是实际上，由于研究者在研究的方法、目的以至对经书本身的看法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而且，随着经师传授源流不同，对经书的解释出现了很大差异，表现出不同的政治观和历史观，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即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西汉前期，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五经都列于学官，而古文经未能列于学官，只在民间私相传授并逐步发展壮大。如西汉（尚书）多用今文经，但孔安国却研治古文经，传授弟子。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秘府文献，研究古文经典，并向汉哀帝提出把古文经《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于学官的要求，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强烈反对，由此今、古文学派展开了长期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实质，说到底就是谁是经学正宗和如何统一经学，即由谁占据经学领导地位的问题。这一斗争，极大地推动了汉朝训诂的发展。下面就对这一斗争做简单的介绍。

汉武帝偏袒今文经学，尤其重视《春秋公羊传》。今文派把孔子看作是政治家，把六经看作是孔子治理天下的学说，所以今文经学偏重于挖掘经中的微言大义，它的特色是注重功利实用，轻视学

术。比如研治《易》的施雠、孟喜、梁丘贺，号称能以占卜推知未来；研治《书》的夏侯胜、夏侯建、欧阳生、倪宽，能以其中的《洪范》来辅助皇帝；治《诗》的申培公、辕固生、韩婴、王吉、匡衡，能以诗篇当谏书；研治《礼》的鲁诸生、贾谊、韦玄成，能以古礼议制度等等。于此可见，经学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庸，儒生们受功名利禄的驱使，在治经中不惜比附引申，以至于琐碎繁杂，一部经书的章句多的有一百多万字，少的也有几十万字。秦延君说（尚书》“尧典”二字，竟达十多万字；说“曰若稽古”四字，也多至三万字。如此繁琐的经说，害苦了学习的人。《汉书·艺文志》形象地说今文经生是“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年幼时就专攻一经，直到头发白了才敢开口讲经），因此，当时“通人恶烦，羞学章句”，即是说由于今文的繁琐，人们都不愿意学习了。其次，今文经学笃守师法，专主一家，老师所传，弟子所受，一个字不敢有出入，违背师说就得不到任用。如传《易》的孟喜，老师是田王孙。孟喜喜欢吹嘘，诈称田王孙临死时曾传给他一本讲阴阳灾异的书。他的同学梁丘贺揭露说，田王孙死时只有施雠守终，孟喜当时到东海去了，根本没有这件事。汉宣帝听说他私改师法，就不准他做博士。由于今文经学笃守师法，学者只会背诵章句，讲说经义，而不能触类旁通，被讥笑为“俗儒”和“章句之徒”。再次，今文经学大多通过各种手法进行狡辩，甚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